

寒州學派對康有為經學 思想的接受與批判*

陳亦伶

提 要

本文通過朝鮮晚期學者與康有為的接觸交流,以及他們對其經學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探討朝鮮半島因受康有為學說的影響,導致在中國儒家經典詮釋上出現轉變。經過本文的研究分析,揭示出朝鮮晚期學者在解讀儒家經典時,已經偏離過去五百多年對中國學者墨守遵循的學習方式,也帶領我們重新發掘周邊國家在中國儒家經典研究上的獨特視角和重要地位。

關鍵詞: 寒州學派 李炳憲 河謙鎮 新學偽經考 儒家經典 朝鮮儒學
文化傳播 跨域研究

一、前 言

學界過去將傳統中國經學的研究視野往周邊國家延伸時,於韓國方面往往著重朝鮮時代退溪李滉(1501—1570)、星湖李瀼(1681—1763)、茶山丁若鏞

* 本論文為“從周邊看中國——朝鮮晚期學者對康有為儒家思想的批判”研究計劃部分成果,計劃得到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UGCGRF 編號:12611020),謹此致謝。

(1762—1836)等幾位大儒的探究；於文人的交流上則側重秋史金正喜(1786—1856)與翁方綱(1733—1818)、阮元(1764—1849)等清代學者的交流。但朝鮮後期學者如壺山朴文鎬(1846—1918)、真庵李炳憲(1870—1940)、晦峰河謙鎮(1870—1946)、重齋金梲(1896—1978)等跨越朝鮮晚期到近代的韓國學者，他們對當時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與接觸。尤其部分儒者透過各種方式與康有為(1858—1927)接觸，吸收康有為的學說思想後，試圖從中尋求救亡圖存之道，並留下不少珍貴的筆談記錄與著作。這對於中韓思想比較、文化傳播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意義與影響力。

但由於貴遠賤今的固有觀念，使得學界長期忽略朝鮮晚期經學論著，除了收錄在《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的著作外，筆者另由《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以及訪查韓國各大圖書館文獻史料，蒐羅朝鮮晚期學者七十餘人的經學論著上百種。與康有為有直接接觸者雖不到十人，但直接論述康有為學說者有數十種，遍及《尚書》、《詩經》、《春秋》、《禮記》等。可見，朝鮮晚期學者對康有為的關注，並不是單一學術現象，乃具有一定的數量和分量。如李炳憲撰有《讀新學偽經考》，專為衍義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而作。又如金梲在其經學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康有為，並尊稱其為“康子”。

然而，這些學者並非全盤接受康有為之說，對其嚴厲批判者亦不少。如康有為提倡男女同棲逾一年需易人，若婦女有孕則入胎教院，嬰兒出生旋入育嬰院之想法，旨以淡化家庭、家族觀念，以達去私之利。但此論點，無論是對當時的中國或對恪守儒家五倫思想的朝鮮而言，顯然是駭人聽聞之見。即便置於現代社會，亦不易實行。而這也是康有為經學思想中最為朝鮮晚期學者所詬病者。又如艮齋學派代表人物田愚(1841—1922)，曾在寫給學生吳震泳(1868—1944)的書信中批評康有為：“渠不過耶穌之家奴，禽獸之同類也。且以三綱平等而無尊卑之分，與《中庸》、《孟子》相背馳。而今日注《中庸》、《孟子》，是猶悖子賊臣而論《忠》、《孝經》，淫婦娼妓之誦《列女傳》也”。¹

無論正面接受或負面批評，康有為的儒學思想在朝鮮晚期，獲得不少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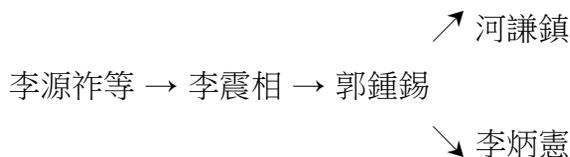
1 田愚：《答吳震泳 己未》，《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之四，《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第334輯，頁204。

注,且起到一定的影響力,使得朝鮮晚期在儒家經典的詮釋上有了轉變。而此為學界尚未觸及探究之論題。故此,本文通過寒州學派學者對康有為經學思想的接受與批判,探究朝鮮晚期對中國傳統經典詮釋的轉變。其中,特別以河謙鎮與李炳憲對古文《尚書》的討論為中心。李炳憲與河謙鎮兩位朝鮮晚期學者恰巧分別在其 27 歲時,拜入俛宇郭鍾錫(1846—1919)門下,成為寒州學派一員。這兩位朝鮮晚期學者對古文《尚書》的看法,皆圍繞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而有一正一反的對立看法。故而,本文旨在以河謙鎮與李炳憲及其師門對古文《尚書》的討論為中心,探究寒州學派對康有為經學思想的接受與批判。

二、寒州學派對古文《尚書》問題的看法

朝鮮時代相當重視家學師門的相承,在各別探討河謙鎮與李炳憲兩人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接受與批判之前,有必要先梳理其師承關係,及寒州學派師門對古文《尚書》問題的看法。

寒州學派的代表人物為寒州李震相(1818—1886),其於 17 歲時向叔父凝窩李源祚(1792—1871)學習性理學,35 歲起又向大山李象靖(1711—1781)、損齋南漢朝(1744—1809)、定齋柳致明(1777—1861)等人問學。但李震相發展出有別於傳統退溪學派的學說,主張明德即是理,往心即理的方向走,強化李滉學說中的主理說,並使之極端化。因而被認為是將退溪學帶往陽明學,被陶山書院一派的傳統退溪學者所攻擊。² 即便如此,在當時還是不少儒生拜入李震相門下,這些門生中,不乏日後成為韓國儒學史上舉足輕重之人。河謙鎮與李炳憲的老師郭鍾錫便是其一。為清耳目,現將其師承關係整理如下:



2 안영상: 《극단으로 간 최후의 퇴계주의자들(往極端前行的最後退溪主義者)》, 《조선 유학의 학파들(朝鮮儒學的學派)》(首爾:藝文書苑, 2009年), 頁 593—594。

前面提到李震相曾向叔父李源祚學習性理學，李源祚是傳統性理學者，他對古文《尚書》的態度是對聖學的絕對尊崇與守護。李源祚的個人文集《凝窩集》中收有《偽古文十六言辨》與《偽古文辨下》兩文，其中《偽古文十六言辨》標題下有“秋史金正喜謫大靜，著偽古文十六言說送示，故作此辨”小字。因而可以推知金正喜於 1840 年至 1848 年流配至濟州島大靜時，³ 曾撰有《偽古文十六言說》，且將之示予當時濟州牧使李源祚。然而李源祚持擁護《古文尚書》的立場，為反駁金正喜觀點而撰作《偽古文十六言辨》與《偽古文辨下》。⁴ 李源祚作為傳統性理學學者，為護衛代表聖人之意的十六字心法，不斷駁斥攷校之學，認為從文字上考辨經書是“信枝葉而疑本根”徒費工夫，為學應講求義理之道。⁵ 而這樣的觀點也影響了李震相。

李震相於《〈尚書〉今古文辨》言：“《書》之真偽當以道理決之，不當以文體論”並對歷來從今、古文《尚書》的文字難易不合常理，認其為偽造之說一一駁斥。如《尚書》內容可大別為典、謨、訓、誓、誥、命六種文體，而誓、命通常是君王與臣子討論國家政策之語，經史官潤飾而成，故較典雅。但誥通常是訓誡百姓之語，為使百姓易曉常加入當時的方言或俚語，故對後代宿儒而言，反而不易了解。朱子亦曾言：“當時百姓都曉得，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者也”李震相以之為據，批駁辨偽者言論。同時由於朱子談論古文《尚書》的言論不少，護衛古文《尚書》神聖性者與力辯其為偽者，各取所需，申論已志。對此，李震相言：“彼駁《古文》為偽書者，每每推援於朱熹，朱熹何嘗說《古文》義理有痕癥

3 金正喜曾因“尹商度獄事”受到牽連，於 1840 至 1848 年被謫居於濟州島九年。1830 年金正喜的生父金魯敬因“尹商度獄事”遭受牽連流配古今島，之後被釋放並復職為判義禁府事。但 1840 年時金正喜又因十年前父親之事，遭受牽連被流配到濟州島大靜，一直到 1848 年才結束流配生涯回到故鄉。

4 有關李源祚與金正喜對古文《尚書》的真偽論辯，可參拙作《朝鮮金正喜〈古文尚書〉辨對清人學說的接受與轉化》，《師大學報》，第 62 卷第 2 期，2017 年 9 月，頁 93—110。

5 李源祚：《偽古文十六言辨》，《凝窩集》，《韓國經學資料集成》（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3 年），冊 66，頁 3—7；“今不求之於心學精微之蘊，只從言語文字上攷校辨說，信枝葉而疑本根，執他賊而證此案，深所未喻……主攷校者，爭錙銖於魚魯，鉞心目於丹鉛。反以譚理道者為陳腐泥古，殊不知信枝葉而疑本根，執稊穀而遺精鑿，終歸於無用而已”。

乎？義理無暇，則其非偽書也，明矣”。⁶

雖然郭鍾錫沒有留下專門針對古文《尚書》論辨的著作，但其門人曾將與老師有關經義的問答編成《茶田經義答問》一書，其中收錄在《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書經十九”的《茶田經義答問一書經》是針對《尚書》的問答，共 319 條。由這 319 條的內容看來，今、古文《尚書》篇章皆有，且郭鍾錫數次提到“恐以《集傳》為定論”。可以推測郭鍾錫對古文《尚書》的看法應該還是遵從其師李震相的態度。至此可知寒州學派師門，李震相上下大抵持擁護古文《尚書》的立場，而河謙鎮自然跟從其師之態度。但郭鍾錫的兩個學生，河謙鎮與李炳憲卻持對立看法。李炳憲明顯是受了康有為的影響而改變其原先視古文《尚書》為聖人之書的看法，而河謙鎮在看了《新學偽經考》後，採取護衛經典的攻防方式，亦與前人不同，下文詳述之。

三、李炳憲與康有為

李炳憲，字子明，號真庵、白雲山人，本籍陝川。著述頗豐，與經學相關者有《孔經大義考》、《書經傳注今文說考》、《尚書補義》、《易經今文考通論》、《禮經今文說考》、《春秋經筆削考》等，現皆收錄於《李炳憲全集》。前文述及，由於李炳憲拜入郭鍾錫門下，自然與寒州學派學者有不少來往，如李震相之子剛齋李承熙（1847—1916），以及四未軒張福樞（1815—1900）、勉庵崔益鉉（1833—1906）、晦堂張錫英（1851—1929）、農山張升澤（1838—1916）、松沙奇宇萬（1846—1916）等人，也間接接觸了華西、蘆沙學派系統的學者。⁷ 李炳憲於其自傳《我歷抄》中自述其於 1903 年在當時漢城南山附近的書店購得康有為《戊戌政變記》一書，得知康有為其人後，開始廣泛閱讀上海出版的漢譯西洋書籍《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公報》、《萬國宗教志》、《哲學要領》等

6 李震相：《尚書今古文辨》，《韓國經學資料集成》（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94 年），冊 67，頁 231—232。

7 更進一步內容，可參閱琴章泰：《유교개혁사상과 이병헌(儒教改革思想與李炳憲)》（首爾：藝文書苑，2003 年 12 月），頁 333。

相關書籍報章。⁸

康有為的孔教論，深深打動身處韓國開化期階段的李炳憲。為尋求救亡圖存之道，李炳憲自 1914 年起曾慕名前往中國五次，以期拜見康有為。康有為對李炳憲影響甚深，如康有為於 1891 年設立萬木草堂，打算用教育的改革推動政治的改革，使得李炳憲亦欲仿效。韓國的培山書堂，⁹ 便是在康有為的指導下而設立。此外，康有為的今文經學思想深深影響了李炳憲，並將之帶回朝鮮，故韓國學者認為今文經學是由李炳憲帶入韓國。當時有不少朝鮮文人欲見康有為，亦是通過李炳憲居中聯繫。由於這項特殊因素，史學界對李秉憲頗有關注，到目前為止已有數篇研究，談到康有為與李炳憲的往來研究。¹⁰ 如帥倩《康有為與朝鮮儒士的交往》、¹¹ 彭春凌《中韓近代儒教改革運動的攜手與差異》、¹² 《康有為、李炳憲交往和思想關係論考——兼及民初孔教運動跨越中韓之傳播與取向問題》、¹³ 陳曉雲《康有為與李炳憲筆談交往考》¹⁴ 等。對於康有為的經

8 李炳憲：《我歷抄》，《李炳憲全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9 年），頁 594，“癸卯三十四歲……忽見坊間有發售清國《戊戌政變記》者，以其欲聞日清戰爭後事實，故購而讀之，始悟東亞大局之變遷，又之康公以儒者而能通世務如此，乃知儒之不可以守舊排新，為自立之計也。因購買《泰西新史》及中西書籍若干部而還”。

9 培山書堂現位於慶尚南道山淸郡丹城面沙月里，為慶尚南道第 51 號文化財。培山書堂的匾額為康有為所題，現址並有相關碑文。

10 由於康有為在政治、歷史、學術上的特殊性備受關注，一直以來學界對其研究甚多，尤其是其與戊戌變法之相關研究。學界雖有幾篇探討康有為與朝鮮文人的接觸，但對康有為思想對朝鮮儒學的影響則關注甚少，且因語言的隔閡、依賴二手資料的傳鈔，而有一些誤解。如康文珮所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與陳漢才編著《康門弟子述略》（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11 年 10 月）提到朴殷植與李炳憲時，於李炳憲下載：“久慕南海先生大名，於 1922 年 7、8 月間渡海問學，訪求真經”，並將李炳憲置於朴殷植之後。然而，若檢閱韓國亞細亞文化社出版的《李炳憲全集》，以及李炳憲與康有為往返的書信等相關史料紀錄，可知李炳憲為拜見康有為曾於 1914、1916、1920、1923、1925 年，五次前往中國。而兩人第一次見面是 1914 年於香港，而非 1922 年。同時朴殷植等當時許多朝鮮文人皆是透過李炳憲，才與康有為結識、問學。《康門弟子述略》中對康有為與朝鮮弟子的敘述，顯然有待商榷。

11 帥倩：《康有為與朝鮮儒士的交往》，《嶺南文史》2012 年第 4 期，頁 27—32。

12 彭春凌：《中韓近代儒教改革運動的攜手與差異》，《當代韓國》，2017 年第 1 期，頁 103—115。

13 彭春凌：《康有為、李炳憲交往和思想關係論考——兼及民初孔教運動跨越中韓之傳播與取向問題》，《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頁 56—76 轉 160。

14 陳曉雲：《康有為與李炳憲筆談交往考》，浙江工商大學亞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9 年，54 頁。

學思想對朝鮮文人的影響,有韓國學者황지원《진암 이병헌의 공교운동과 금문경학(真庵李炳憲的孔教運動與今文經學)》、¹⁵이상하《眞庵李炳憲의 經說에 나타난 종교적 성향(眞庵李炳憲經說中展現的宗教性傾向)》¹⁶兩文。然而,對於《新學僞經考》對韓國經學的影響則尚未獲得深入關注。

此外,若相較於朴殷植(1859—1925)、李承熙、張志淵(1864—1921)、申采浩(1880—1936)、咸錫憲(1901—1989)等韓國近代思想家,李炳憲於韓國學界是相對較不受注目者,最早研究李炳憲的韓國學者應為首爾大學宗教系名譽教授琴章泰(1943—),撰有《유교개혁사상과 이병헌(儒教改革思想與李炳憲)》一書。其根據李炳憲的《魯越日記》、《中華遊記》、《北遊日記》、《真庵略歷》等日記史料,梳理了李炳憲五次前往中國的路綫,轉譯整理如下:¹⁷

時 間	路 綫	會 面 地 點
第一次 1914年2~5月	(韓國)安東→(韓國)奉天→北京→曲阜→南京→上海→杭州→上海→香港→上海→蘇州→南京→上海→安東	香港亞賓律道 ¹⁸
第二次 1916年6~10月	安東→上海→杭州→南京→曲阜→泰安→鄒縣→徐州→南京→上海→南通→上海→安東	杭州楊庄
第三次 1920年3~4月	安東→上海→南京→曲阜→天津→奉天→安東	上海辛園
第四次 1923年2~9月	安東→上海→南通→曲阜→上海→青島→濟南→泰安→曲阜→上海→杭州→上海→安東	青島、杭州康莊
第五次 1925年2~8月	安東→上海→杭州→徐州→曲阜→上海→青島→濟南→曲阜→青島→大連→安東	杭州一天園、青島

15 황지원: 《진암 이병헌의 공교운동과 금문경학(眞庵李炳憲的孔教運動與今文經學)》, 《한국학논집(韓國學論輯)》, 2018年3月, 第70輯, 頁7—37。

16 이상하: 《眞庵 李炳憲의 經說에 나타난 종교적 성향(眞庵李炳憲經說中展現的宗教性傾向)》, 《동양고전연구(東洋古典研究)》, 2010年, 第41輯, 頁385—406。

17 琴章泰: 《유교개혁사상과 이병헌(儒教改革思想與李炳憲)》(首爾: 藝文書苑, 2003年12月)。

18 亞賓律道(Albany Road)位於香港島中環半山區,當時康有為在香港的居所。

承上表,可知康、李兩人於 1914 年 5 月 21 日¹⁹第一次於香港碰面,兩人相談甚歡,之後在上海碰面時,康有為將《新學偽經考》示與李炳憲。《新學偽經考》斷言古文經皆為劉歆(前 50—23)所偽造,無論是對當時的中國或朝鮮文人而言,皆是相當震撼之言論。李炳憲曾於其《孔經大義考》中提到閱讀《新學偽經考》後,一方面感嘆康有為的考證精詳,另一方面卻也感到“愕然失圖、甚懷不平”。會有如此反應,主要是因性理學家奉為圭臬的虞廷十六字心法,被證明非聖人所作有關:

數年前謁南海康先生於滬上,先生出示《偽經考》一部,奉讀未半,歎其考覈審博,下語停當。而至以《虞書·大禹謨》為偽書,則愕然失圖,甚懷不平。以為自讀書以後,尊信舜禹授受人心道心、惟微精一等語,豈是劉歆所杜撰者哉?先生曰:今虞書又非劉歆偽,乃王肅偽,見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人心道心二語,是荀子而王肅采之。²⁰

雖感悵然若失,但也許是康有為的孔教說,切中李炳憲欲求救亡圖存解決之道之心,故其很快地便服膺於康有為之說,包含《新學偽經考》。此可由李炳憲著作獲得明證,如其撰有《讀新學偽經考》者,專為衍義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而作。又其《尚書》相關論著有《書經傳注今文說考》、《尚書補義》,是朝鮮時代乃至近代韓國學者的《尚書》論著中,唯一僅釋今文《尚書》,完全捨棄古文《尚書》篇章者。尤其《書經傳注今文說考》中直引《新學偽經考》者,不下數十條。

朝鮮時代學者在論辯古文《尚書》真偽問題時,常以朱子為據,認為朱子只說書序可疑,不曾說過經文的內容有問題。同時朱子交代蔡沈(1167—1230)續承《書經集傳》,足以證明朱子與蔡沈都是認可古文《尚書》的神聖性。但李炳憲舉丁晏(1794—1875)之語,認為由閻詠(生卒年不詳,閻若璩之子)所輯之《朱子書疑》已可充分顯示朱子也疑心古文《尚書》真偽,故不作《書傳》。李炳憲除附和丁晏之語外,更進一步指出當時坊間刻印之《書傳》,亦因朱子、蔡沈

19 《我歷抄》中記載的日期為農曆 4 月 27 日。

20 李炳憲:《孔經大義考》,《李炳憲全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9年),頁 81—82。

疑古文《尚書》真偽，才刪去綱領。並為朱子與蔡沈兩人抱屈，認為若其身處後世，將會更能掌握文獻，辨明真偽，發揮孔子真義：

山陽丁晏曰：“閻潛邱《古文尚書疏證》附其子詠輯《朱子書疑》一卷，偽古文《書》朱子已發其覆，是以不作《書傳》，疑之甚也。”余謂九峯蔡氏承朱子之學，亦疑偽書，坊刻《書傳》前刪說書綱領，而先儒精析之論，湮而不彰。……嗚呼！朱、蔡兩先生之苦心於今、古之難處之地者如此，若使在今日開通之時代，瀏覽今、古文原委所係之經籍，則自當發揮孔門所傳微言大義。²¹

然而，李炳憲實有所誤會，朝鮮時代乃至現在韓國通行的《尚書》讀本是五經大全的中的《書傳大全》本。查閱《朝鮮王朝實錄》可知，《四書五經大全》在1415年9月刊印完成後，僅僅不過四年，便已傳到朝鮮半島。²² 又，由1427年的記錄可知，世宗（李祹，1418—1450年在位）時便下令將其頒布於朝鮮八道，命各道刊印予儒生研習經書之用。²³ 因而，朝鮮時代讀書人所學習的《尚書》底本是《五經大全》中的《書傳大全》。但問題在於，在朝鮮八道各地刊印的《書傳大全》，將《書經集傳》卷首載錄今古文《尚書》歷代傳本源流的内容刪去，包含《書說綱領》。較李炳憲早兩百年之朝鮮學者金鍾正（1722—1787）已發現這個問題，首次揭示於其個人文集《雲溪漫稿》中：

愚按朱熹注《尚書》僅止於《大禹謨》，而首載孔安國《序》及漢《藝文志》、唐孔穎達說。又為總說於其下，以見經文之顯晦本末，及古文、《今

21 李炳憲：《孔經大義考》，《李炳憲全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9年），頁100—101。

22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1年12月7日丁丑記事：“敬寧君祹、贊成鄭易、刑曹參判洪汝方等回自北京。……一日，詔祹陞殿上，帝降御座，臨立祹所跪處，一手脫帽，一手摩髻曰：‘汝父汝兒皆王，汝居無憂之地，平居不可無所用心。業學乎？業射乎？宜自敬慎讀書。’特賜御製序新修《性理大全》、《四書五經大全》及黃金一百兩、白金五百兩、色段羅彩絹各五十匹、生絹五百匹、馬十二匹、羊五百頭以寵異之。”本文引用之《朝鮮王朝實錄》為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建置之電子版資料 <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23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9年9月3日戊子記事：“傳旨慶尚道監司：今送大全《易》、《書》、《春秋》依《性理大全》例刊板。”

文》之同異多寡，蓋如論、孟《集注》首載序說之例矣。蔡氏《集傳》亦循朱熹之舊，故嘗見唐本，以此并載於首卷，而鄉本則盡刪之，其誤殊甚。²⁴

金鍾正認為這是一項相當大的疏失，儒生因此未能學習到今、古文《尚書》各版本文獻內容，而使儒生們未能確實掌握好各傳本間的師承源流、相互關係，進而無法辨別真偽。即便如此，金鍾正的看法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大體而言，整個朝鮮時代還是護衛古文《尚書》的經典地位。

四、河謙鎮對《新學僞經考》的批判

河謙鎮，字叔亨，號晦峯、畏齋，本籍晉陽。編著有《朱語節要》、《陶文酌海》、《明史綱目》、《東儒學案》、《海東名將列傳》、《東詩話》等書，另有後人爲其編纂之《晦峯先生遺書(晦峯集)》。韓國學界對河謙鎮的關注並不多，1988年姜東郁的《河晦峯漢詩研究》²⁵是韓國學界首次出現關於河謙鎮的研究，之後進入兩千年，即2002年之後才陸續出現相關研究。許宗文的碩士論文《晦峯河謙鎮研究》，首次整理了河謙鎮的生涯與家系、學問與思想、詩文學等內容。²⁶目前，對河謙鎮的研究可大別爲對其文學(漢詩)的研究，²⁷與儒學思想的研究

24 金鍾正：《書傳笥錄》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89年)，冊58，頁653—654。

25 姜東郁：《河晦峯漢詩研究》，慶尚大學校國語國文學科碩士論文，1998年，頁95。

26 許宗文：《晦峯河謙鎮研究》，慶尚大學校漢文學科碩士論文，2002年，頁50。

27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李永淑的研究，有《晦峯河謙鎮의 和陶詩 研究-화도시 개요 및 저작배경을 중심으로(晦峯河謙鎮의 和陶詩研究——以和陶詩概要與撰作背景爲中心)》，《南道文化研究》第18輯(2010年)，頁169—196；《晦峯河謙鎮의 ‘首尾吟’에 대한 小考(晦峯河謙鎮“首尾吟”初探)》，《南道文化研究》第20輯(2011年)，頁307—333；《晦峯河謙鎮의 “和陶詩”와 “首尾吟”研究(晦峯河謙鎮的 和陶詩和首尾吟研究)》，慶尚大學校漢文學科博士論文，2012年，頁168；《晦峯河謙鎮의 “和陶詩”와 東坡 蘇軾의 “和陶詩”比較研究(晦峯河謙鎮的“和陶詩”與東坡蘇軾的“和陶詩”比較研究)》，《南冥學研究》第39輯(2013年)，頁109—146；《회몽 하검진과 연민 이가원의 문학론 고찰(晦峯河謙鎮與淵明李家源的文學論考察)》，《淵民學志》第27輯(2017年)，頁47—73。另外還有하정승：《하검진의 ‘동시화’에 나타난 비평의식(河謙鎮《東詩話》批評意識研究)》，《漢文學論集》第32輯(2011年)，頁209—243。共6篇。

兩大類，²⁸共 12 篇。在儒學思想的研究上有三篇是對其《東儒學案》的分析，有兩篇是對其國性論的論究，另有一篇是從其年譜論述其性理學內容。

河謙鎮對康有為經學思想的批判，主要體現於《晦峯先生遺書(晦峯集)》卷二十四之《康有為論語注序條辨》、卷二十五之《古文〈尚書〉辨》、《筆記》及與友人的書信中。河謙鎮批評康有為的經學思想主要可分為對《論語注序》、大同說與《新學偽經考》的批判。其曾言：

昔年聞康有為所著《論語注》、《中庸解》二書，皆在中州書局，因人往來上海者，購之終不可得。近有人持示《論語注序》一篇，其文亦首尾不完，然而其義，概可見矣。姑辨之。²⁹

可知河謙鎮原先欲讀康有為《論語注》、《中庸解》二書，購之未果，偶見序文，讀後便作此文。眾所周知，康有為大同說立基於《禮記·禮運》篇，其中內容之一，便是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闡發延伸為“兒童公育主義”，對此河謙鎮批駁道：

妻之生子則送育嬰堂養之，不使之其誰為所生，如此則公民效力於國家，而無家之可私……西人有柏拉圖者，倡為妻子不可私有之說，康氏

28 정성희: 《식민지 시기 조선 유학사 정리 작업에 대한 연구-장지연과 하검진의 저항적 조선유학사 정리 작업을 중심으로-(殖民地時期朝鮮儒學史研究——以張志淵與河謙鎮的反抗性朝鮮儒學史為中心)》, 《儒學研究》, 第 29 輯, 2003 年, 頁 165—191; 崔一凡: 《“東儒學案”의 學派 分類에 대한 考察(《東儒學案》的學派分類研究)》, 《儒教思想研究》, 第 21 輯, 2004 年; 頁 123—140; 金洛真: 《晦峯 河謙鎮의 國性論을 중심으로 본 일제강점기 유학자의 인간성 이해와 국가의식(從晦峯河謙鎮的國性論為中心看日帝強佔期儒學者的人性理解與國家意識)》, 《韓國哲學論集》, 第 24 輯, 2008 年, 頁 70—101; 유영옥: 《晦峯 河謙鎮의 “國性論” 분석(晦峯河謙鎮的“國性論”分析)》, 《東洋漢文學研究》, 第 31 輯, 2010 年, 頁 175—196; 김기주: 《회봉(晦峯) 하검진(河謙鎮)의 학문 활동과 성리학적 특징(晦峯河謙鎮的學術活動與性理學特徵)》, 《韓國學論輯》第 70 輯(2018 年), 頁 91—119; 權峰女: 《〈東儒學案〉淺析》, 《朱子學刊》2018 年第 1 輯(總第 31 輯), 頁 210—220, 共 6 篇。

29 河謙鎮: 《康有為論語注序條辨》, 《晦峯集》(首爾: 亞細亞文化社, 1985 年), 頁 485。

淫於西人，而為其奴隸，欲敗壞中州五千年神聖之遺教，甚矣！³⁰

康有為提倡男女同棲逾一年需易人，若婦女有孕則入胎教院，嬰兒出生旋入育嬰院，淡化家庭觀念達到去私之利的想法，無論是對當時的中國或對恪守儒家五倫思想的朝鮮而言，顯然是相當駭人聽聞之見。即便是現在，依然不易實行。而這也是康有為經學思想中最為朝鮮學者所詬病者。如艮齋學派代表人物田愚，曾在寫給學生吳震泳的書信中批評康有為：

渠不過耶穌之家奴，禽獸之同類也。且以三綱平等而無尊卑之分，與《中庸》、《孟子》相背馳。而今日注《中庸》、《孟子》，是猶悖子賊臣而論《忠》、《孝經》，淫婦娼妓之誦《列女傳》也。³¹

河謙鎮與李炳憲的老師郭鍾錫也同樣不能接受康有為之說。³²

又，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斷言古文經皆為劉歆所偽造，無論是對當時的中國或朝鮮文人而言，皆是相當震撼之言論。大體而言，河謙鎮《古文尚書辨》中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批駁，可梳理為八點，分述如下：

1. 重申古文《尚書》的神聖性不容置疑

河謙鎮首先簡要敘述古文《尚書》的出現過程，並言“列於學官，經生學士誦習《古文》更千餘年，信如金石，守如四時，無復有異辭矣”³³直言其信憑性不容置疑。接著指出堯舜二典、禹謨接是朱子手定，並口授蔡沈《集傳》，即便是吳澄（1249—1333）也僅是處於心疑的階段，並未直言古文《尚書》為偽，以此捍衛其神聖地位。

30 河謙鎮：《康有為論語注序條辨》，《晦峯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5年），頁485—486。

31 田愚：《答吳震泳己未》，《艮齋先生文集》後編卷之四，《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第334輯，頁204。

32 參《侁宇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第341輯，頁247；第342輯，頁96。

33 河謙鎮：《尚書古文辯證》，《晦峯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5年），頁494。

2. 批評清代漢學家破壞古經

接著批評清代漢學家之考據學以“破壞古經為能事”，並言：“近世有康有為《偽經考》者，作以《古文尚書》斷然以為劉歆之書，其所辨，殆至數十萬言之多，而要之，皆臆為之說，無一言可據為明證者。夫漢學何為者也？是欲與程朱為背馳也。六經之旨至程朱大明，彼其初欲所廢於程朱注說，為凌跨以出於其上，又恐其言之不售，而人之不信也，遂乃變亂六經，以神其姦，以愚天下之耳目。嗚呼！其亦不仁矣！彼輩雖不信程朱，獨不信恐子乎”。³⁴

3. 孔子時已有古文《尚書》

河謙鎮舉《論語·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明確出於《泰誓》；又《堯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者”孔子雖不言其出處，但詳其語勢為《大禹謨》之文無誤；《為政》篇中有孔子自言：“《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考其《書》名可知來自《君陳》篇之“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等。河謙鎮以這些例子證明孔子時已有古文《尚書》，言：“孔子之時已有古文《尚書》，不亦章章明矣乎”。³⁵

4. 孟子引古文《尚書》最多且詳

此外河謙鎮又陸續引了《孔叢子》、曾子、孟子等言論中，述及古文《尚書》內容者，並言孟子是引古文《尚書》最多且詳細者。如《萬章》篇中的“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來自《大禹謨》。又指《公孫丑》“禹聞善言則拜”必出自《大禹謨》：“禹拜昌言曰：‘兪！’”之語。《滕文公下》與《梁惠王下》的“湯始徵，自葛載”、“東面而徵，西夷怨；南面而徵，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等出自《仲虺之誥》。又《萬章上》“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源自《伊訓》等。此外，河謙鎮認為古文《尚書》又見諸於《禮記》、《左傳》、墨子、管子、商鞅、劉向之書者，不一而足，由此皆可為明證。倘若仍認為古文《尚書》為偽經，以其晚出於武帝之時，不早為伏生所口傳，因而懷疑是劉歆所偽造。那麼順此脈絡，假如伏生老而死，其壁藏之書出於孔書既出之後，則是將《今文》一併列入懷疑。那麼天下則

³⁴ 河謙鎮：《尚書古文辯證》，《晦峯集》，頁494。

³⁵ 同上注，頁494—495。

“無復有真經矣”。

5. 劉歆無偽造聖人言語之能力

康有為認為劉歆因承其父業，利用職務之便，故有利於偽造。對此，河謙鎮駁之：“歆雖號為能文，如《大禹謨》中‘精一執中’、《湯誥》中‘若有恒性’是啓萬世心學之淵源。且如《尹訓》、《說命》之篇，皆典重切實，本原天理而合於事情，曾謂歆能為之乎？”³⁶認為劉歆無偽造聖人言語之能力，又舉方苞“先儒以古文《尚書》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³⁷之言輔之，駁斥康有為認定古文《尚書》為劉歆所作之說。

6. 竄入之說可笑

對於康有為言劉歆為使偽作之事達到天衣無縫，曾竄入《史記》一事，河謙鎮駁之曰：“以《史記》此段為劉歆竄入，誠有是焉，歆之為計，可謂巧矣。然歆之智及此而已？要必遍竄羣書，以證其說，然後可矣。”³⁸此外，康有為認為《論語》、《孟子》、《管子》、《說苑》等書，引用古文《尚書》者，皆為劉歆所竄。河謙鎮認為以劉歆其父所藏之書繁多，較於當時其他人更便於遍覽使用，此點無庸置疑，但偽造經文此等大事“天下之人有目皆見，一手而掩，無是理也”並言“余竊獨以為秦政焚經之罪小，漢學亂經之罪大”³⁹指責康有為之惡甚於秦始皇。

7. 若為劉歆所偽大同之說亦不可信

康有為認為事實上並沒有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藏書一事，但其懷疑古文《尚書》、《周官》、《禮記》皆疑為劉歆所偽，卻沒有疑心同時出現的《論語》、《孝經》，河謙鎮對此不解，又言：

康子一生所苦心提倡之者，大同之義也，大同二字不見於它書，僅見於《禮記·禮運》之篇。如康子說，則大同之義，實自劉歆發之，奈何尊信其言，並作《禮運》注解以行於世也？……抑其意以為《禮運》雖是劉歆

36 河謙鎮：《尚書古文辯證》，《晦峯集》，頁495。

37 同上注，頁495。

38 同上注，頁495。

39 同上注，頁495。

偽撰，而少康大同之說，不害為聖人經義，故姑信其為孔子之言耶？噫！《禮運》果歆撰也，則注解不必作，大同不可從矣。非歆撰也，則非惟《禮記》孔壁之書皆不可以言偽矣。孟子曰：“遁辭知其所窮”，康子於此將何以自解說哉？⁴⁰

由此可知除了《新學偽經考》，康有為的其他著作或看法也流傳到朝鮮。

8. 一字之誤不可以偏概全

承上，康有為指出魯恭王於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薨，為武帝元朔元年。元朔元年乃武帝初，武帝末豈有壞孔子宅之事？對此河謙鎮認為古書傳鈔致誤，乃常有之事，應是《藝文志》誤將初字誤植為末字，不應以一字之誤，而盡疑全文。

河謙鎮固然因傳統性理學之信念，擁護古文《尚書》，但康有為為圓《新學偽經考》之說，不乏牽強武斷之論，甚至提出劉歆為了欺瞞後世，事先鑄造鐘鼎彝器埋下，驚世駭俗之語。無怪乎連其門生梁啟超都要言“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⁴¹

五、結 語

綜上，即便寒州學派在當時的朝鮮學界被認為是較開放、創新的一派，但上下師門除李炳憲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影響，信古文《尚書》為劉歆偽作之說外，皆持擁護古文《尚書》觀點。綜觀朝鮮時代參與論辯古文《尚書》真偽的學者不少，但與明清學者最大的差別是，擁護古文《尚書》神聖性者多於辨其為偽者多。而護衛古文《尚書》的觀點常是以“聖人之言不容侵犯”、“朱子未曾言其為偽書，便是真經無誤”、“義理無誤便非偽書”等，無視於辨偽派提出的史料證據，近乎迷失於絕對尊崇朱子的方式來擁護。但河謙鎮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一一提出論據反駁，有別於先前朝鮮學者的絕對尊崇，可謂一

40 河謙鎮：《尚書古文辯證》，《晦峯集》，頁495—496。

4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頁57。

大進步。

綜觀整個朝鮮時代,即便意識到古文《尚書》可能為偽,最終仍採取折衷的觀點,希望保全《尚書》的經典地位。就如同現代學者戴君仁所言“偽書儘管是偽書,好書依然是好書,所以這二十五篇偽古文,我們不看作上古的經典,三代的信史,而只當部子書,仍然是有很高的價值的。”⁴²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42 戴君仁:《古文尚書作者研究》,《孔孟學報》,1961年4月,第一期,頁35—46。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二) 論文

戴君仁：《古文尚書作者研究》，《孔孟學報》，第1期（1961年4月），頁35—46。

二、韓文

田愚：《艮齋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第334輯。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

李源祚：《凝窩集》，《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66冊。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3年。

李炳憲：《李炳憲全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9年。

金鍾正：《書傳筭錄》，《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冊58。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89年。

河謙鎮：《晦峯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5年。

琴章泰：《유교개혁사상과 이병헌(儒教改革思想與李炳憲)》。首爾：藝文書苑，2003年。

韓國思想史研究會編：《조선 유학의 학파들(朝鮮儒學的學派)》。首爾：藝文書苑，2009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年，<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Kang Youwei's Scholarship on Confucian Classics as Accepted and Critiqued by the Hanjoo School

Chen I Ling

(Research Associate, Centre fo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tact and exchange between Kang Youwei (1858 – 1927) and Korean scholars in the late Joseon era and their acceptance and criticism of Kang's scholarship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chang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riggered by the influence of Kang Youwei's philosophy. It aims to show that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ome of these scholars of the late Joseon era had already deviated from the methodology adopted by Chinese scholars over the previous 500 years. It also leads us to rediscover the unique perspectives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ir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Keywords: The Hanjoo School, Yi Byeong-Heon, Ha Gyeom-jin;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Forged in the Xin Dynasty*, Confucian classics, Scholarship of Korean Confucianism, Cultural exchanges, Cross-culture study